

中國歷代

創業帝王

王寿南 著



本书分析历代创业帝王得国的时势、身份、凭借、素质、机缘以及能否长期保持基业的关键。

虽属历史，但鉴往知来，值得各界人士细读与思考。



中國歷代

創業帝王



王寿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美国商务印书馆及台湾商务印书馆授
权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7-05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创业帝王/王寿南 著. —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633-6587-6

I. 中… II. 王… III. 政治-谋略-中国-古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941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 300mm 1/32

印张:8 字数:200千字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作者介绍:

1935年生，福建武夷山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台湾政治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文理学院院长。著有《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隋唐史》、《唐代政治史论集》、《唐代人物与政治》、《唐代的宦官》、《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等书。

目录CONTENTS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一治一乱	1
第二节	创业帝王之意义与范围	10
第二章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的时势与动机	17
第一节	时势的重要与种类	17
第二节	时势之一——前朝政乱	23
第三节	时势之二——战乱	28
第四节	时势之三——前朝式微	33
第五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时之时势分类录	38
第六节	政治上之人性	46
第七节	动机—权力—因势图谋	49
第八节	动机——自保与权力	57
第九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之动机分类录	64
第三章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前的身份与凭借	71
第一节	身份的意义	71

第二节	身份的种类	73
第三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前之身份分类录	77
第四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之凭借	82
第五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之凭借分类录	95
第四章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的方式	102
第一节	政治伦理观念之演变与得国方式	102
第二节	禅代与古代政治	122
第三节	历代创业帝王得国之方式分类录	126
第五章	创业帝王得以成功原因的分析	132
第一节	成败与天命	132
第二节	时势之结果	138
第三节	敌手之无能或错误	147
第四节	才智与度量	166
第五节	信任智能	172
第六节	善于收拾人心	180
第六章	创业帝王与国祚的关系	183
第一节	创业帝王对王朝的责任	183
第二节	创业帝王对优秀分子之争取	189
第三节	创业帝王对于忠君观念之提倡	196
第四节	创业帝王对于安定民心之措施	204
第五节	创业帝王对于中央集权之努力	212
第六节	创业帝王对于封建同姓宗亲之实行	223

第七节 创业帝王对于利民善政之施行.....	228
第七章 结论	235
附 录 中国历代创业帝王一览表	244



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一治一乱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①一治一乱的历史哲学古今中外学者皆曾提出，揆诸史实，政治上的治兴统一与衰亡分崩相迭代起，而中国古代历史尤为如此，无怪乎有人倡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自古无千载国家”^②乃是中国历史上铁定的事实，从较为可信的朝代——夏起，到君主政体的结束——清止，先后在中国本部的中原立国而稍具规模的王朝达三十二个之多，其中国祚最长者为周代，计八百五十六年，最短者为五代的后汉，仅四年^③，“千载国家”确非所有，难免不令人感叹“命不于常”！

然则一姓王朝何以衰废？他姓王朝何以代兴？其中缘由至为复杂，且深堪玩味。人类心理实有一种合理化的企求，对于任何事情总喜欢给予它合理——至少自认为合理化的解释，然而古人深受神权的影响，最简单且最能为人所接受之答案厥为“天意”，《左传》之中每可见到这种记载：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五，《与元幼主书》，页三。

③ 根据董作宾、严一萍合编：《年代世系表》。



(晋公子重耳奔楚)子玉请杀之,楚子曰:“……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①

楚子代陆渚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②

“国之将兴,神明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监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③

孔子对于一治一乱虽未有明白的解释,然以其思想内容推之,则“天命”殆为可能之答复^④,既以兴亡国祚归诸天命,是故“有国必亡,卜年着其数”^⑤,其实天命为不可测之事,天命之说不过出自一二人之口,多数的愚夫愚妇在神权的恐怖下奉之若神明,历代创业之主莫不假造神迹,自言天命以感人心^⑥。然而具有怀疑态度之学者对于捉摸不定的天意解释,并不能感到满意,但另觅解释不仅非为易事,并且可能为崇拜神权的一般人民所不能接受,最简单而容易想到的办法,乃是将“天命”之说加以注释,加以伸延,这便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人事解释。

这种“天命”归因于“人事”的说法,不仅较合理可信,而且对于暴君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② 《左传·宣公三年》。

③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④ 详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章,页九七。

⑤ 《宋书》,卷二,《武帝纪》。

⑥ 阅二十五史,各代创业帝王本纪于创业之前莫不有神迹或奇貌,例如《史记》汉高祖多神迹而降生尤异,《晋书》记司马懿有奇貌,《宋史》记宋太祖生时赤光绕室,体有异香,《明史》记明太祖生时亦有赤光异香,此皆较著者,正史尚如此,其他野史稗乘所记更为神异。



政治是一个永远的有力警告,因此,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政治上兴亡的看法十九赞成寓天意于人事,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①陆贾曰:“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世衰道亡,非天所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②历代史家对于兴亡史事极为重视,而其解释也多倾向于人事^③,然则,历代败亡相继,何以后代不能鉴前代之失而仍趋向灭亡,实足令人深思。

《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便有帝王,时日久积,在人们心目中,帝王之设乃为当然且必需之事,《尚书》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稟聪明,作元后。”^⑤“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师。”^⑥“无主乃乱。”^⑦甚至认为帝王一姓相袭乃事所必需^⑧,诸子百家之政治主张虽各有不同,而拥护君主制度则一,于是君主制度在我国所享之权威,成为至高至上,帝王本身的地位更绝不容人民有所怀疑,帝王的权力之大,笼罩全国,一切政治权力(有时甚至财富、名誉等权力)的泉源来自帝王,只要帝王愿意坚持,他可以做任何他所要做的事^⑨。自古以来从谏如流的帝王并非没有,但是他们的肯于从谏,乃是出于他们本心的志愿,唐太宗是以从谏如流著

① 《荀子·天论篇》。

② 《新语·明诫第十一》。

③ 例如司马迁论秦之亡,借引贾谊《过秦论》,则“秦不及期”之因在人事以败。陈寿论魏武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隋书》论隋之亡在炀帝之虐。《新唐书》以李唐之兴乃在时势之利,皆是。

④ 《诗经·小雅·北山》。

⑤ 《尚书·周书·泰誓上》。

⑥ 《尚书·泰誓上》。

⑦ 《尚书·商书·仲虺之诰》。

⑧ 《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页十五,仲堪曰:“主非一姓则百姓生心,祚无常人则人皆自贤。”

⑨ 此处所言帝王指拥有其全部权力之正常时代的帝王,当王朝式微时,帝王受权臣的挟持,权力已被削夺,所谓“祭则寡人”,只是形式上的君主,自非此处所指的帝王。



名的,但是他的从谏乃是因为他鉴于隋亡而觉得纳谏对他有好处才自愿接受的^①,一个自任其智的帝王并没有任何强制的力量足以迫他纳谏。

然而,正由于帝王的权力太大,遂造成了历史上兴亡的循环。汉仲长统于此尝有精辟之论说:“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心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彼后世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牴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芜庶政,弃亡人物……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膏脂,断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普者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②仲长统所论实际上将中国历史上由盛而衰而亡的过程描了个轮廓。唐魏征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③从仲长统、魏征论中似已暗示出君主专制一姓当朝的政治必然地发生兴亡交替的现象,从历史事实中加以推敲,此种兴亡交替之现象,殆为无可避免者,何以故?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条,谓唐太宗勇于受谏之故:“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

② 《仲长统论·昌言论·理乱篇》。

③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一》。



自秦始皇废封建之后,在中国的历代政治上,帝王便占据了极端重要的地位,所谓“一国之事本之一人”^①,权力之大,乃周以前所绝无者。李斯劝秦二世“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②,后世帝王虽再无人敢出此言,但实际上他们除了受制于自己的观念、想法和良心外,并不受外界力量的约束。同时中国自古以来也没有任何法律来约束帝王,人性本属好逸恶劳,无限制的权力最易使人沉湎于耽乐之中,然而,帝王耽乐过度往往成为荒淫暴虐,在专制的时代帝王本身绝不能脱离政治,而帝王的行为便能直接地影响实际政治。帝王过度的享受对于实际政治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为了供应帝王的享受,政府不得不对百姓重税厚敛,这种经济上的榨取一旦超过了限度,必然地盗贼蜂起,隋末群盗之起即由于“苦于上之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迫,救死菑蒲”^③。盗贼蜂起乃引起战乱,而战乱又足以使王朝式微,王朝式微又是王朝覆亡的前奏;另一种结果是由帝王的恣意享乐,不理政事,大权下移,大权下移的时日经久以后,臣下便取得威势,而王朝也日渐衰替,终成“大盗窃国”之局。由此可见帝王的过分享受最后的结局都将是悲惨的。所以无限制的权力固然可以提高帝王的威严,但也能够产生可怕的后果。

然而,无限制的权力对于创业帝王来说,尚不会对王朝发生不利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创业帝王都如此,并且此处所指的不利结果系指对王朝本身而言),何以故?赵翼尝谓开国之初,“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④。创业之主目睹前代覆亡的悲剧,对于帝王独具的无限制权力认识较为深刻,他们既知无限制权力的正面——可爱,同时也看出无限制权力的背面——可怕,所以他们对于这一权力的运用实较后世继体之主更为谨慎,来之既属不易,自不免战战兢兢,唯恐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羨之传》。

② 《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③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史臣曰。

④ 《廿二史札记》,卷十九,“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条。



有失。^① 在历代创业帝王中见诸史载，最能体会“殷鉴不远”的当推唐太宗。唐之得国，太宗亲临行阵，力取群雄，深知隋代覆亡之由，眼见自家创业如此艰难，而杨氏失国易如反掌，自然“耳所闻，目所见，深以为诫”^②。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



宋太祖 赵匡胤

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③ 在《贞观政要》中太宗以隋亡为鉴之言极多，盖隋鉴“朕所目见”印象太深，时刻不能忘也。不仅唐太宗，其他的创业帝王——甚至参加创业工作的后妃臣子也同样每每具有高度的警惕心。宋太祖受周禅，尊母杜氏为皇太后，“太祖拜太后于堂上，众皆贺，太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太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④ 杜太后亲见五代

① 明太祖在祖训中不仅对于朝廷的法制有所制定，而且对于继体之君、后妃、诸王的日常生活、行动，甚至警卫的设置皆有明文予以规定，可见创业之主对于王朝唯恐有失的心理。

② 《贞观政要》，卷十，《论行幸第三十七》。

③ 《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第二》。

④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杜太后传》。



之季国亡身灭之祸极烈，虽然其后宋得国三百二十年，但杜太后所虑，绝不应视为杞人忧天之言。东汉建武十九年，光武帝至南顿，置酒赐吏民，“复南顿田租一岁，吏民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识知寺舍，每来辄加厚恩，但复一岁，少薄，愿复十岁。帝曰：‘天下重宝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远期十岁？’复增一岁。”^①王莽在备受歌颂“天下靡然成风”的情况下僭移汉鼎，但不及十五年而亡，其成也奇，其败也速，光武以是为鉴，“天下重宝大器，常恐不在”，诚系由衷之言。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众皆欢甚，唯后（世祖昭睿顺皇后）不乐，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众人皆喜，尔独不乐，何耶？’后跪奏曰：‘妾闻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子孙及此则幸矣。’帝以宋府库故物各聚置殿庭上，召后视之，后遍视即去，帝使宦者追问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贮蓄以遗其子孙，子孙不能守而归于我，我何忍取一物耶。’”^②明太祖孝慈皇后尝侍太祖，曰：“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贤人共理天下。”^③元世祖后目击亡国之人，明太祖后身历艰难，自不免产生警惕之心。清太宗尝谓群臣曰：“前蒙古察哈尔林丹悖谬不道，其臣不谏，以至失国，朕有过，尔诸臣即当面诤，使面从而退有后言，委过于上，非纯臣也。”^④清太宗招抚汉人，积极谋取中国鉴人之亡以为己镜。唐太宗尝曰：“吾之抚国，良无景公之过，但吾才弱冠举义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谓三代以降，拨乱之主莫臻于此，重以薛举之骁雄，宋金刚之鸷猛，窦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据洛阳，当此之时，足为劲敌，皆为我所擒。及逢家难，复决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颇有自矜之意，以轻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⑤创业之主见前代因专用私智，耽乐暴虐而亡，于是多不

① 班固：《东观汉记》，卷一。

② 《元史》，卷一百十四，《世祖昭睿顺皇后传》。

③ 《明史》，卷一百十三，《太祖孝慈皇后传》。

④ 《清史稿》，《太宗本纪二》。

⑤ 《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



敢拒谏,有时更导人以谏,自言其过,其意即在唯恐重蹈前车覆辙。^①所谓“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②创业帝王距离“亡国”最近,对于这种历史教训,自能牢牢记取。《新唐书·魏征传》载:“征曰:‘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者饮,桓公请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无危矣。’”魏征所言虽未必事实,但可见身历患难者对所受之患难具有特别深厚之印象,所以最具警惕心,而这种警惕心正是后世子孙所缺乏者。

创业之主虽然多能够“取监前古,凛若驭朽”,却无法保证继体子孙之必然勤政谨慎,相反地倒可以预料到本朝的衰亡。唐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理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大凡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行,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③房玄龄谓政乱之因在主,考之史实,自属可信。唐太宗以政乱归咎于臣,则未免流于强辩自护,盖自东汉以后,功臣子弟虽仍有其名位,但在实际政治上则甚少发生重大影响,执政大臣莫不由帝王任命,政乱之因安可归咎功臣子弟?唐太宗似乎未尝不知此理,因此不能不说“主既幼弱”,等于默认房玄龄所言为是,盖继体之君,“不知创业之艰难,不恤黎元之疾苦,谓威权在手,可以力制万方,谓旒冕在躬,可以坐驰九

① 《贞观政要》,卷十,《灾祥第三十九》,太宗曰:“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四海又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及见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及此,不觉惕焉震惧!”可明看出创业之主的纳谏,其意在恐自骄自逸,而蹈前代败亡之辙。

② 《贞观政要》,卷八,《论刑法第三十一》。

③ 《贞观政要》,卷三,《论君臣鉴戒第六》。



有,曾不知聚则万乘,散则独夫。”^①因此唐太宗唯有承认“古来帝子生于宫闱,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②。虽云前古,推之唐以后诸世也莫不如此。宋张昭曰:“帝王之子长于深宫,安于逸乐,纷华之玩,丝竹之音,日接于耳目,不与骄期而骄自至。”^③《周书》亦称继体之主“体自尊极,长于宫闱,佚乐移其心,骄贵荡其志”^④。由于环境的关系,不仅继体之君,甚至创业帝王有时也不免享受奢侈,不过,创业帝王由于手定大业,威势未衰,且较具警惕之心,虽有时放纵,却也不会发生灭宗毁庙的事^⑤,然继体之君往往威势渐衰,又“矜历数之在己,忽王业之艰难”,生活的腐化自必造成王朝的衰亡,顾祖禹谓:“自古创业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⑥,理或在此。

中国的君主历数千年而不变,根深蒂固,虽然屡经革命变乱,但旧王朝的推翻,代之而起的乃是一个新的王朝,帝王专制的局面殆无改变。在政治上,帝王的权力超过一切,而又没有法律加以限制,政治上的政令措施,本诸帝王的意旨,无限制的权力属于一人,而运用者的才智性情又属下愚,难免滥用权力,不顾人民的疾苦。R. M. MacIver曾说:“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固定的领袖,特别是当他的领袖体系由于世袭或其他方法确定时,权威就获得了一个新的体积,于是居权威者就远离人民。”^⑦中国君主世袭,世代愈后的君主离人民愈远,中国的被统治者是极具忍耐性的,服从与名位的观念深入人心,除非万不得已绝不敢反抗居尊位者的命令,然而忍耐是有限度的,求生与自卫乃是人类的本能天性,一旦政治

① 《旧唐书》,卷十六,《穆宗本纪》。

② 《旧唐书》,卷七十,《王珪传》。

③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张昭传》。

④ 《周书》,卷十二,《齐杨王宪传》,史臣曰。

⑤ 除新莽、五胡十六国外,并无一个朝代的帝王一身兼历创业与覆亡二事。

⑥ 《唐鉴》,卷四。

⑦ R. M. MacIver, *The Web of Government*, p. 39. 又英国爱克登爵士曾有一句名言,即一切权力必趋于腐化,而绝对的权力,其腐化亦绝对。



上的威权影响到其生存时,必然发生反抗,战乱从此而起,而战乱的结果又必然地削弱王朝威信,使王朝日趋衰微以致覆亡。



唐太宗 李世民

“治乱相因,理不常泰”,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明确的佐证。唐太宗戒子孙曰:“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①唐世子孙终不免失国之运,此何也?盖专制政体本身即含有兴亡之循环也。在帝王专制政体下,有一姓王朝之兴,即可预料该姓王朝之亡,兴亡之运,循环不已,这是创业帝王所喜(不如此无以得国),亦正是其所忧(因如此而致亡国),无论如何,对于创业帝王而言,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要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话,只有取消帝王的专制,这在传统帝王乃一切权力来源的观念下,创业帝王是绝不愿做的,于是兴亡交替的现象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循环不已了。

第二节 创业帝王之意义与范围

爱权是人类天性之一,古代的政治更脱离不了权力,近来许多学者更认为权力问题是政治的中心问题^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权力高

① 唐太宗:《帝范》,总结。

② 浦薛凤:《政治权力之构成与保持》,页一,载《政治大学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近三四十年来西方政治学者特别看重权力之研究,甚至认为权力问题乃是整个政治学之中心。”罗素也说:the Fundamental concept in Social Science is Power, in the same sense in which Energy i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in Physics. B. Russell,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p. 10。